

再——解釋
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

吳昶興 主編
Wu Chang Shing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Collected Essays Wu Chang Shing

再——解釋

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

吳昶興 主編
Wu Chang Shing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Collected Essays Wu Chang Shing

再——解釋： 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

編者：吳昶興

責任編輯：許光璇、陳慧娜

總策劃：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

出版者：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36號3樓

電話：(02)3234-1063 網址：blog.yam.com/cclmolive

傳真：(02)3234-1949

發行人：李正一

發行：華宣出版有限公司 CCLM Publishing Group Ltd.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36號3樓

電話：(02)8228-1318 傳真：(02)2221-9445

郵政劃撥：19907176號 網址：www.cclm.org.tw

香港地區：橄欖（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總代理：Olive Publishing (HK) Ltd.

中國香港荃灣橫窩仔街2-8號永桂第三工業大廈5樓B座

Tel:(852)2394-2261 Fax:(852)2394-2088

新加坡區：益人書樓Eden Resources Pte Ltd

經銷商：29 Playfair Road #02-00 Lin Ho Building, Singapore 367992

Tel:6343-0151 Fax:6343-0137

E-mail: eden@eden-resources.com

Website: www.edenresource.com.sg

北美地區：北美基督教圖書批發中心 Chinese Christian Books Wholesale

經銷商：603N, New Ave #A Monterey Park, CA91755 USA

Tel:(626)571-6769 Fax:(626)571-1362

Website: www.ccbookstore.com

加拿大區：神的郵差國際文宣批發協會

經銷商：Deliverer Is Coming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B109-15310 103A Ave. Surrey, BC Canada V3R 7A2

Tel:(604)588-0306 Fax:(604)588-0307

澳洲地區：佳音書樓 Good News Book House

經銷商：1027, Whitehorse Road, Box Hill,

VIC 3128, Australia.

Tel:(613)9899-3207 Fax:(613)9898-8749 E-mail:goodnewsbooks@gmail.com

封面完稿：果實文化

承印者：橄欖印務部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701號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年份：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刷次：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Collected Essays

By Wu Chang Shing

Copyright © 2014 by Taiwan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All Rights Reserved

Cat. No. A53TW1503

ISBN 978-986-6131-24-0 (平裝)

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Printed in Taiwan

襄助

歷史文化叢書

學術委員會

主編

吳昶興
WU CHANG SHING

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學術委員

古偉瀛
GU WEI YING

台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邢福增
XING FU ZENG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李天綱
LI TIAN GANG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China

林金水
LIN JIN SHUI

福建師範大學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徐以驊
XU YI HUA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China

陶飛亞
TAO FEI YA

上海大學
Shanghai University, China

曾慶豹
CHIN KEN PA

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蔡彥仁
CAI YAN REN

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總序

在上個世紀的七〇年代，美國新歷史學會會長費正清 (John Fairbank) 在學會年會上號召美國年輕一代學者研究影響中國社會進程與中外關係的課題，成立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出版了一大批關於中國基督教史地論文與著作。在稍晚的時期，大陸、台灣、香港也不約而同地開始出版大批的中國基督教史相關的論文與專著。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早年兩岸三地的學術圈中，仍屬邊緣性的題目，未能形成獨立的學科，有關的研究附屬在中外關係史、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學或思想史這類課題底下。然而，經過數十年的耕耘之下，已經逐步建構出基督教在華人社會及文化發展的種種現象，故此，基督教史研究如今已然具備獨立學科的雛形，相關的研究機構、隊伍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而治史的方法，也跳脫傳統的研究方法，結合了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理論等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並且，過去不易取得的材料，如今越來越公開，流通更迅速，使得基督教史的研究有了更大的突破，避免過去的某些意識形態或某種壟斷「史觀」的權威，使得詮釋上更能趨近歷史的真相。並且，這種發展態勢，使得中國基督教史在華夏作為一門獨立自存的人文學科，可說已是既存的事實。

回顧研究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始於十九世紀，早期多半出自傳教士或是海外教會史家的手筆，華人最早的一本教會史，

是「福漢會」成員王元深的《聖教東來考》(1899)，成為華人最早記錄基督教入華的一部史著。此後，這類作品逐漸多了起來，如《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1911)、《中國耶穌教會小史》(1918)、《中國佈道近史初編》(1918)、《中國基督教史綱》(1940)等。除通史性的論著之外，個人傳記、群傳、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反教運動、宗派史、堂會史等各種類型的著述也增多了起來。將基督教史研究上及唐、元、明有關景教及天主教的研究，則不能不提陳垣，他的〈元代也里可溫考〉(1917)、〈基督教入華史略〉(1924)、〈基督教入華史〉(1927)擴大了研究範圍，兼容了各基督教派在中國的發展。

1949年後，這類中國基督教史的著述陷入了一個沉寂的時期，主要的研究以北美的學人為主，例如Paul Varg、Suzanne Barnett、費正清、魯珍晞(Jessie Lutz)、柯文(Paul Cohen)、Philip West、Sidney Forsythe、Ellsworth Carlson、Irwin Hyatt等人對於早期傳教士、地區史、非基運動、傳教士報刊、中國基督教大學史等做了傑出的貢獻，將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再往前推進了一大步。如今仍活躍在這個領域並與中國學者積極交流的有裴士丹(Daniel Bays)、德裔旅英學者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

台灣與香港是研究基督教史的重要學術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可謂推動中國基督史研究的重鎮，早期的主要成員有張貴永、呂實強、王爾敏、王樹槐、李恩涵，整理了清代總理衙門檔案有關教案的史料《教務教案檔》七輯23巨冊(1974-81)。主持基督教機構宇宙光及任教中原大學的林治平，在1970年代開始出版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有關著作，並積極推動研討會，廣邀兩岸三地及西方學者參與，成果頗豐。前台灣大學歷

史系教授查時傑的《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1983)結集了四十位傑出的華人基督徒領袖的生平及有關史跡，開拓了研究華人基督徒的方向，成為這類研究的歷史前輩。而天主教研究，方豪則是佼佼者，他的《中西交通史》(1959)及《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1970)極有代表性，帶動了研究天主教的風潮。輔大、台大、清大的歷史系，以及中研院的天主教研究都相當深入，值得一提的是，中研院院士暨清大教授黃一農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2008年第二版)在觀點、研究方法及材料皆具創新，他所提出的「e考據」儼然成為未來研究的重要路徑；中研院的李爽學以其精湛的比較文學功力追溯耶穌會翻譯文學的發展與變異，更加擴大了文本研究的方法與視野。

香港佔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是基督教入華的重要基地，也是最早意識到當地教會史重要性的發源地之一，劉粵聲牧師的《香港基督教史》(1941)是一本標誌性的著作。簡又文的《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1956)則是研究太平天國相當權威的一本著作，旅港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施其樂(Carl Smith)則專治香港基督教史，為研究早期的中西教士、信徒、宣教事業、逼迫事蹟等都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繼之者有李志刚牧師，其《基督教早期來華傳教史》(1985)、《香港基督教史研究》(1987)皆有代表性。此後，香港研究基督教史可謂百花齊放，在幾位為首的學者的帶領下，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梁元生、吳梓明、邢福增，浸會大學有李金強、黃文江，建道神學院梁家麟，他們投入極大的熱情推展基督教史的研究，不僅成果斐然，也培育了不少下一代的年輕學者。

改革開放後，大陸在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研究，無論在數量、質量上，成果都相當豐碩，並在各地形成研究基督教史

的學術群體，茲舉幾個有代表性的學術機構及其為首的學者：北京大學的孫尚陽、北京社科院的趙曉陽、社科院宗教所的段琦、王美秀、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張西平；山東大學的路遙；復旦大學的李天綱、徐以驊；上海大學的陶飛亞；華中師範大學的章開沅、馬敏、劉家峰；福建華東師範大學的林金水；廈門大學的張先清；中山大學的吳義雄；澳門大學（原暨南大學）的湯開建等。此外，四川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澳門利氏學社、上海社科院宗教所也都人才輩出，研究數量日見蓬勃，帶動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成為主流，所涉及的課題幾乎無所不包，例如：傳教士及其宣教、中國教會學校、區域及個案、教案、基督教本色化、華人信徒及領袖、女傳教士及信徒、少數族群、外交、文學、藝術等，方法論也結合了其他學科，史料的挖掘屢有創新，使研究又邁向另一個新階段。

來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已進入了關鍵性的階段，探討基督教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研究其在中國不同階段的歷史的發展、演變，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在今日現代世俗化及多元化的華人社會中，基督教將具有怎麼樣的特性，這類的研究課題將帶來更深遠的意義。基督教在中國過去以來一直處於社會的少數，在文化上相當的弱勢，處於外緣的地位，自唐入華以來，經過千餘年的努力，從被忽視、拒斥、逼壓到如今的生根、茁壯、發展，經過一條相當艱辛的路，中國基督教的前輩謝扶雅先生曾云：「基督教在中國的成功，端賴中國教會之必須自養、自理、及自傳；而此三者之得圓滿達成，又必恃乎基督教與中國思想的相與會通。」由此看來，研究基督教史的意義也在此，為基督教提供了一個客觀的背景，指出可能的會通之路。

這套叢書期盼能做到「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繼續

前人探討基督教在中國歷史的各種面向，但更多從社會、文化的視野予以關注。「入乎其內」就是深入地瞭解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國的歷史，無論是其信仰立場、神學語言、思想特徵、代表人物、組織結構等，能夠確實地掌握與瞭解；「出乎其外」則是跳出某一教派或神學立場的限制與偏見，在學術研究上保持客觀與公正追求嚴謹的研究成果和學術結論。

在此特別感謝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財團法人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及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宗研所長期致力於基督教在華人文化的扎根，將兩千年基督教文化遺產，積極轉化成當代華人文化及台灣社會的思想資源，而蒲公英希望基金會是一個具有強烈的福音使命感，有豐富出版經驗的文教機構，雙方的合作希望可以在中華文化脈絡與台灣本土社會底下從事相關的基督教研究，也期盼這套叢書能發揮基督教的普世性、公共性、社會性的精神，具體地檢視基督教在華人文化社會所呈現的底蘊及種種意義。

導言

梁啟超曾讚譽明末中外天主教學者所留下的作品為「千古不朽」之作，又對中國學術界帶來不小的影響，云：「……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無庸我再為讚歎了。其餘《天學初函》、《崇禎曆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曆算學很豐厚的遺產……要而言之，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¹可見，當談論明清社會思想與文化，是無法繞過「天主教」（西學）的，它對中國所產生的影響也需要重新再評估。然而，過去主流學者未能確實掌握、理解明末清初天主教有關的中文著述不下於千餘種，而給予應有的重視，故而天主教的研究在過去被視為教會內部の研究，或為天主教的傳播服務，是一門非主流／邊緣的學科。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經過三十年的耕耘，²時至今日，天主

¹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里仁書局，1995），11。

² 黃一農在1990年代中對於大陸的研究有所微辭：「現今大陸學者對境外的研究成果多頗為陌生……，在原始文獻的掌握上亦嫌不足。」見氏著，〈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變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第七卷第一期（1996年3月）：147-148。但今非昔比，大陸學界的發展快速，質與量已後來居上。

教研究已是一門顯學，套用學者的語言，天主教的研究已被視為中國文化、思想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界也更加重視天主教與中國社會的關係，甚至是中國與國際的關係。這種門戶之見被打破之後，越來越多的學者都已接受「基督宗教研究」不只是研究基督教在華人中間的傳播與影響，也是學術界必須發展的學問，故而基督宗教也能像佛教那樣成為中國宗教傳統與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被認真嚴肅看待。

天主教既是宗教，又是西方文明體系，當進入到中國，所引起的各種反應、衝擊、互動、交流、融滲……，已經逐漸地從底層庶民、士紳至統治階層帶來截然不同以往的精神世界以及天文地理、器物科學等，但這種衝擊與影響仍沿著中國傳統裡環繞著個人生命與群體生命所關注的基本問題而展開，促成了傳統思想產生了分歧、演變或復甦，尤其對於儒家傳統中的濟世與修身中的宇宙觀、倫理道德、鍛鍊身心的工夫論，提供了另一種視域，在研究上也帶來了新的「論域」。³這裡面所涉及的中西文本、社群結構與意識、各種文書、方志、族譜、民間資料，特別是近年由中西漢學家所出版的原始中文文獻，更加速推進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國學者在此一領域整體的提升與進步十分顯著，實不容小覷，故有學者說：「在二十年前中國學者研究這一研究領域時，如果不讀西方學者的著作，你就無法真正展開學術的研究；那麼今天，我們可以說，如果西方的學者不看中國學者近十餘年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也一定會受到影響。」⁴職是之故，本論文集便在這種想法裡產生，邀請了

³ 李天綱，〈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張先清編《史料與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

⁴ 張西平，〈明末清初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新進展——兼評余三樂《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肇慶學院學報》第28卷第6期（2007年11月）：52。

十餘位學者，共十四篇論文，為讓讀者對中國此一研究領域有更多的認識，將這近十年來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成果在此做一展現，選輯的重點在於研究觀點、方法或視域上有所突破，如從思想史、社會史、傳播史、婦女史等角度；另一重點在於史蹟或史料，如新發現的文史、遺物、材料或考據等。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主任暨徐光啟-利瑪竇文明對話研究中心學術主任李天綱教授的〈中國禮儀之爭：研究方法及其拓展〉這篇論文曾在2013年3月12日於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以演講的形式發表，在此要感謝李教授願意將這篇論文放到這本集子，實是本論文集之榮幸。本篇概述與總結了「中國禮儀之爭」的研究，循著歷史學到宗教學、從中西文化交流到經學與神學的相遇這樣的進路探討，嘗試總結作者最近二十年的學術歷程，並且也回顧評價了中國學術界如何開闢一條新的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研究路線。本篇首先回顧漢語文獻的開掘及其意義，探討明清學術史的「西學」與「漢學」的關聯，並審視了「中國中心」觀，反省「民族主義」話語。另外，文中亦提出了西文文獻對於明清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也認為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討論必須參照耶穌會以外的團體（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等）的史料，而龍華民的《論中國宗教的若干問題》所闡述的耶穌會非主流觀點亦應受到重視。如果「中國禮儀之爭」的研究還有生命力，它的題目更有意義，資料還能發掘，方法還能出新的話，則需要從中國歷史學的領域，擴展到其他學科領域，比如：擴展到世界近代史、比較宗教、宗教和文明對話，甚至國際政治、民族國家研究、經學與神學關係研究等課題。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鄒振環的〈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對開封猶太人古教古經的追尋〉，研究中

國開封猶太人艾田上京拜會利瑪竇並告知開封的猶太人情況，促成利瑪竇派遣耶穌會士到當地考察證實，艾儒略與龍華民相繼到開封實地調查。耶穌會希望能使開封猶太人皈依基督教，此願望由畢方濟所開始落實，後來費樂德與恩理格接續這個事業，但河南一帶的天主教因為清朝禁教受到打擊，唯有採取閉關自守的策略，教會處於秘密或半公開的狀態。在禮儀之爭中，耶穌會士試圖以歷史悠久、漢化程度高的中國猶太人作為論據，反擊來自其他修會的抨擊。耶穌會士駱保祿、孟正氣和宋君榮等著手蒐集的開封猶太人的一手資料，是有關中國猶太人研究中的重要著述。可惜的是，他們的書簡未能及時寄到羅馬時，教廷已就這場爭論作出了仲裁。耶穌會士在開封所進行的基督宗教之歷史追憶，不僅為了提高天主教的權威性，更希望在禁教的風波過後，透過與在開封作為合法宗教機構的猶太群體的連接，支持自己在華活動的合法性。文中最後指出，這場追尋開封猶太人古教古經，並未能為在歐洲的中國禮儀之爭提供真正的學術支援。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韓琦的〈耶穌會士和康熙時代曆算知識的傳入〉，從康熙時代科學、宗教和政治背景討論耶穌會士上京擔任御用教師的經過，以及他們所從事的曆算活動。曆法之爭令康熙開始向傳教士學習西學，使曆獄得以平反，多位耶穌會士成為了御用教師，受到優厚禮遇。康熙對精通曆算和醫學的傳教士尤其感興趣，一度對西方科學深信不疑，但過後卻轉變。「中國禮儀之爭」引起清廷和教廷之間的衝突，令康熙對天主教產生戒心，逐漸對傳教士失去信任，康熙下令只許有學問的傳教士入華，以「用其技藝」為首要考量。1713年設立獨立於欽天監的「蒙養齋算學館」，耶穌會士也被召集進入傳授知識，儘管康熙對西士西學已有所懷疑，但

對於有學問的傳教士予以應有重視。不過，康熙時代原有絕佳機會實現科學近代化，終究因為禮儀之爭，加上葡萄牙派和法國耶穌會士之間的矛盾以及後來雍正皇帝的政策，致使算學館被撤銷，影響了歐洲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董少新的〈明末奉教天文學家鄔明著事蹟鉤沈〉，本篇研究資料甚少的天文學家鄔明著，他是徐光啟所組建之曆局中的骨幹成員，對修成《崇禎曆書》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現存的中文及葡萄牙文文獻，勾勒鄔明著修曆與奉教事蹟，進而凸顯曆局成員所構成的天主教人脈網絡及其對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作用。促成湖廣開教。鄔明著參與的修曆工作包括計算、觀測、校訂和繪圖等等。在修曆工作大體完成後，他辭職並返回家鄉。通過傳汎際神父於1638年所寫的兩份關於湖廣傳教的報告，雖沒直接寫出鄔明著之完整姓名，但透過其中的細節可推敲出鄔明著在領洗入教後，信仰虔誠，將天主教帶入其家鄉武昌，促成武昌開教工作中的積極貢獻，這是明末清初在華耶穌會士所發展的人際網絡在擴大傳教面的重要性之顯著例子。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紀建勛的〈明末天主教*Deus*之「大父母」說法考證〉，本篇留意了明末天主教提出了不同的基督教神的中國名字，其中一個較少受到學者關注的是「大父母」。本篇認為「大父母」最早由利瑪竇在1595年以前所提出。若追溯「大父母」說法的淵源，可在《周易》的宇宙論中找到「乾父坤母」的依據，並在宋明理學中得到發展。傳教士和入教士大夫們擷取儒家「大父母」的思想，改造成為倫理化的對天主的稱呼，其意義上與宋明理學的「大父母」已完全不同。天主教的「大父母」之意涵，更多是出於一種「比喻」或「指代」的證道策略，其目的是借助儒家的孝道觀念來

引導世人尊敬天主。在「大父母」這一本土化思想的光照之下，應證了神學與儒家的倫理思想、宋明理學又得到了一個融合，能在代表儒學的「仁」與代表神學的「愛」之間找到「最大公約數」。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劉耘華的〈天主教東傳與清初文人的思想重構——以「敬天」風潮為中心〉，本篇以「敬天」風潮為中心對清初文人的思想重構及其與天主教的關係進行探析和總結。晚明天主教入華，吸引一批中國文人「學事天主」，並促使儒學產生「敬天」的趨勢，至清初，「敬天」成為「儒學宗教化」的主流。未入教的文人儒士以「敬天」為樞紐來嘗試重構思想系統，給靜坐、內斂、涵養為主的心性陶冶活動增添了一個「超越性他者」的「天」參與監督的維度，並透過「敬天」的儀式予以外在化、踐履化，因而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他律性品格。但是，他們心目中的「天」，涵義是模糊籠統的，與本質清晰、界分明確的西方「天主」大相逕庭；這種「天」即物而在、因物而顯，絕非脫離物質、超絕存在的人格神。論文最後以黃宗羲、孫奇逢等理學大儒的「上帝觀」為例對中西之間的上述差異作出了補充論述。

澳門利氏學社助理研究員劉晶晶的〈明末清初天主教與禪宗的關係〉，指出明清之際儒學逐漸退出政治並轉為社會取向，以致佛學復興。佛教與當時傳入的天主教會遇相交的文獻，以《聖朝破邪集》為代表。作者指出目前的研究多以《聖朝破邪集》為基礎，整理耶佛衝突的過程與爭論，卻未探討當時的歷史處境，如晚明禪學盛行的風氣與其對儒士的影響，本篇從天主教徒對禪宗的各種批判，選取其中幾段作為範例。明末清初徐光啟、張星曜等批判當時風行的文字禪、棒喝、看話頭，顯示文字禪已淪為把弄文字的物件，棒喝亦成為盲棒亂喝

的現象，看話頭發展到後來也弊病叢生。楊廷筠對晚明佛教的評論指出宗門非但不能除事障理障，更存在種種弊端。當時在文人間盛行的「狂禪」，亦喜作「禪悅之會」，對當時的思想界以至文藝界具有極大吸引力，導致晚明士子與思想界出現棄儒書重禪學的風潮，晚明禪宗復興成為天主教傳入的競爭者。本篇探討徐光啟、楊廷筠、張星曜等皈依天主教的原因，認為這與當時學術界的實學思潮有關，關心生死大事卻不願逃禪入佛者，認為天主教的戒律和宗教生活乃實學，故捨虛無佛道，信仰天主教，其實是對當時禪風的一股反動。

浙江傳媒學院副教授羅群的〈神蹟故事與晚明天主教傳播中的資訊失真——以《口鐸日抄》和《勵修一鑒》為例〉，利用兩份晚明的文獻《口鐸日抄》和《勵修一鑒》為依據，分析傳教士與當地中國教徒對神蹟的不同理解，並比較當地天主教與民間神靈信仰，從傳播學角度探討天主教本地化的過程中資訊失真的原因。《口鐸日抄》記載了艾儒略在1630-40年與教內外人士的對話，由福建中下層人士教徒所編，大量記錄天主教經典神蹟故事，以及一些傳教士們親見親聞或不同地方流傳的神蹟故事。《口鐸日抄》有兩處是以中國人為主人的神蹟故事，與《勵修一鑒》下卷內容相似，具有大量中國傳統鬼神故事的元素，當中教徒們驅魔被認為與中國師巫類似，只是法術更高強，故事中帶有強烈的中國式佛教色彩或符合儒家道德思想的觀念，這與傳教士對神蹟的理解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此傳播過程的資訊失真原因：一是福建文化素來盛行各種神靈信仰；二是當時傳教士人數少，加上語文的障礙，令他們難與當地教徒深入對話；三是當時廣大信徒群體是沒受過教育的平民，往往是因為神蹟或是基於功利心態入教，對於天主教義的認識非常有限。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教授張先清的〈疾病的隱喻：清前期天主教傳播中的醫療文化〉，指出清代傳教士藉着民間醫事活動吸引民眾入教，並透過圍繞疾病所建構的社會想像，在民間社會中與中國各種宗教信仰競爭。民間社會裡人們常以鬼神作怪等神秘理由理解疾病，令宗教力量的介入提供空間，從撫州女子得怪病的故事得到一個理解，醫療活動成為了清朝天主教的有效傳教手段，逐漸改變了明末重譯述輕實踐的方式。從在宮廷為皇室治病到為基層民眾施醫贈藥，行醫讓傳教士可以大範圍地接觸各種階層的人群。本篇所收集的十九起清代民眾因病入教的案例可看出，大部份都是起因不明的疑難雜症，而醫療過程往往將緣由與鬼怪聯繫起來，先是向和尚、道士等求助但不見效，不得不將痊癒的希望轉向天主教。天主教的驅魔治病的儀式一般都要求患者家人將家中的偶像燒毀，接受天主教教義，然後配合聖水、十字架、念珠等再祈禱，即可讓瘋病止住。類似的醫療活動終於在中國創造了有利的環境，成為「福音的婢女」。

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肖清和的〈詮釋與歧變：耶穌形象在明清社會裡的傳播及其反應〉，本篇以《進呈書像》、《造物主垂像略說》等文本，研究耶穌形象在明清社會裡的傳播及其影響。分析傳教士通過聖母抱嬰像、耶穌像等方式將耶穌形象引入中國，然後以聖像的方式在明清社會傳播耶穌形象。傳教士在中文著作中通過古代儒家經典中所構建出的上帝形象來進行移植或披戴，來鋪墊耶穌的誕生、受難與救世，這裡面也包括了中國信徒在其著作中對耶穌形象的理解與詮釋。本篇以《進呈書像》為個案，研究傳教士在繪畫作品中如何使用本土化的方式構建與傳播耶穌形象，分析明清士人對耶穌形象的反應，尤其是反教人士對耶穌形象的理解。最後，本篇指出傳教